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 剑桥插图中国史

〔美〕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 赵世瑜 赵世玲 张宏艳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 剑桥插图中国史



山东画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剑桥插图中国史: 黑白版 / (美) 伊佩霞著; 赵世瑜等译.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2.3

ISBN 7-80603-635-0

I. 剑... II. ①伊... ②赵... III. 中国 - 历史  
IV. 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第 003437 号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 1996 Calmann & King Ltd

This book was designed and produced by CALMANN & KING LTD,  
London

Project editor: Damian Thompson

Picture research: Merylyn Thorold, Zhang Shuicheng, Wanglu, Qiu xi

Layout: Andrew Shoolbred

Cartography by Harelines, Charlbury, Oxford

A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本书据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年版译出

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山东省版权登记 图字: 15-1998-007 号

书 名 剑桥插图中国史

著 者 [美] 伊佩霞

译 者 赵世瑜 赵世玲 张宏艳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 编 室 (0531) 2060055 - 5420

市 场 部 (0531) 2906847 2053182 (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mailto: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址: 临沂市解放路 76 号 邮编: 276002)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规 格 16 开 (889 × 1194 毫米)

19 印张 217 幅图 292 千字

印 数 7001-9000

I S B N 7-80603-635-0 / k · 142

定 价 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 中译本序言

最初让我写作本书是为出版一套世界各国的图说历史，面对的是英美的一般读者。它必须很简明，要避免出现太多读者不熟悉的名词和术语，尽可能好地利用图片资料。尽管我以前作为研究唐宋史的专家写过学术性的著作，也为大学里学习中国史的学生编过资料，但我此前从未试图为普通读者撰写关于中国的书。为了让那些随时都会合上书的成年读者兴趣盎然，我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这十多亿人口——比东欧、西欧和北美人口的总和还多——逐渐认为自己拥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认同感，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那样，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分裂成一个个相互猜忌的群体？在本书中，我试图表明，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其中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它的形声书写系统，以及强大统一政权的长期经验。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的长期性也是很突出的。

多年来，中国史学家集中解释了王朝的兴衰，但在世界上多数其他地方却不是王朝而是整个文明此兴彼衰。人们发现，现代史家可以从当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思想或制度，追溯到埃及人、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马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但没有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这些文明的直系子孙。人口随着连续不断的移民和入侵浪潮而变化，新的宗教则创造了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意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类型的例外？难道中国从未遭受过同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吗？新民族的涌入从未有这样大的规模？新的思想或宗教对于人们的认同感从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或是中国人在别的民族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选择留心连续性？尽管我不会离开中国历史经验的特殊性质，但在本书中，我更强调中国文化，在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注意连续性的趋势。

在写作本书时，我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对付这些问题而且不会非要有个所以然不可。因为我相信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已试图表明，在各个时期，在创造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人是如何利用他们继承的遗产的；我也试图表明，他们在努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时候，是如何提出新思想，进行新实践的。依我看，中国的今天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上，它总是具有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这意味着每一个阶段都是故事的精华部分。我希望，这个译本的中国读者会发现我作为一个外人的兴趣所在。尽管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利用的史料与中国史学家的相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迥然不同。我期望着能从中国读者对我的努力的反应中获得教益。

伊佩霞

## 写在前面

中国历史常常被看作是西方历史的镜子。在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2—公元前220年）中国统一之后，后来的统治者被北方游牧民族和外来宗教的传入颠覆了，这颇类似于罗马。但中国与罗马不同的是，它再度兴起，在唐朝（618—906年）统治下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世界性的大帝国。汉朝的许多体制得到了恢复，自汉末以来就很强大的门阀政治依然保持着影响，但是它却认可一种具有真正权力的世界性君主。唐代中国的世族门阀也不像欧洲的封建领主，他们需要朝廷授予他们的爵位和名号，这会给他们带来保护其大地产的特权。

自唐至宋（960—1279年）皇权得到进一步的集中，门阀贵族变为一种社会—科层制<sup>①</sup>精英，而成熟的考试制度越来越多地造就了他们。那些致仕之后退隐乡里的官员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士绅，其思想本质上是与帝制政府一体的。随着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日益扩展，儒家的社会伦理逐渐被认定为中国政府所依赖的准则。

中国史是一个具有内在吸引力的对象，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有了更强的魅力。例如，中国尤其是从元朝（1260—1368年）以来，对西部和西北部的穆斯林世界的态度如何？从宋代直到20世纪，尽管有了长途贸易和意义重大的城市化过程，却不存在政治上活跃的商人阶级，我们从中又能获得什么教益？

伊佩霞是研究从汉到宋中国家庭与家族史的杰出学者，曾经细致地分析了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社会—科层制精英们的文化社会观，也分析了由宋朝帝王和哲学家们制订的冠、婚、丧礼。她是一部被广泛使用的资料书——《中国文明与社会》的编者，在此书中，她又探讨了研究对象从明清直至20世纪的发展。她以一种平实、凝练的文体，将其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渊博知识运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因为她确信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可避免的。

本书大量的图片展示了艰苦探索的成果；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陶器到食品）和著名作家生平的形象也为本书增光添彩。但是，作者对中国悠久历史仔细而清晰的概述，才是最引人注目的。我相信，本书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经典。

刘广京

<sup>①</sup> 科层制是指社会组织内部的职责权力划分体制。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此概念分析工业社会的某种理性组织。这种制度把对管理权限的规定及职务分等、权威分层的原则与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相分离。在这种制度下，职员要经过专业训练，工作须照章办事等等。——译者注

## 序 言

首次访问中国的西方人可能会发现大量好奇、惊讶、迷惑、刺激乃至沮丧的事情。中国的人口总数就让人大吃一惊：有十亿多汉族人——比东欧、西欧、北美的人口总数还多。这么多人怎么能把自己视为共享同一种的文化呢？为什么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没有使他们像世界上其他民族那样分裂成相互猜忌的群体呢？一个单一的政府是怎么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的？

除了被其人口吓了一跳之外，访问者也会对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感到好奇。男人们女人们在农田里耕作，在市场上买卖，在公园里爱抚着他们的孩子，在餐厅里品尝着美餐：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上个世纪的混乱是如何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是如何思考的？

中国的乡村也可能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讲中国话的人定居的地区），可以用来种庄稼的土地被看得太珍贵了，以至不能作为放牧之类非生产性用途而被浪费。甚至那些可以提供木材和劈柴的山林也经常被开辟成梯田来种庄稼。为什么中国人把他们的土地变成了一个花园？在中国的农业技术和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对于一个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城市空间也有着意想不到的面貌。在中国的城市中，当人们伫立在实实在在的名将贤相的塑像面前，历史并没有悄然而至，人们也无法找到曾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古老的房屋、庙宇和宫殿。甚至像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这样的古都，都缺乏实在可见的纪念物，而这些却可以在与其类似的罗马、雅典、伦敦或巴黎随处可见。难道中国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英雄人物，抑或中国人在以另一种方式尊崇这些英雄？的确，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发现古老中国的遗迹，但是这些人工制品向它们自己提出了质疑。古代的杰作——青铜礼器、山水画、书法、瓷器——似乎常常对人们眼里的当代中国的诸多事情沉闷无声地进行抗议，提出了使人苦恼的问题：中国文化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了吗？今昔之间的文化联系难道变得如此弱小，以至二者可以被视为不同的文化？那些问这些问题的人，可能也正好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是否公正：我是不是按照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审美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的美学成就？我是不是在把中国历史上的精英文化与今天的大众文化相比较？本书正是为那些愿意思考这类问题的人所写。

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复杂的社会，它经历了数千年的形成过程，不理解它的过去就不会明白它的现在。与西方那种把中国视为静止不变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历史的陈旧观念相比，中国如何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国的故事更充满了戏剧性。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都利用了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但是他们在创造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在他们奋力发现意义和秩序、实现他们的愿望或与敌人抗争、生存和繁荣、照料他们的家庭和履行他们的责任过程中，他们也提出了新思想，做出了新实践。因此现实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的历史之中，而历史又以某些看上去不明显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潜力。这些都意味

着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为这整个的中国故事提供了实质性内容。

人们可以写一部“大中国”的通史，这个“大中国”是东亚的一个区，中国在其中起了支配性的作用，而这个区的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疆土。但这里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多少小一些的工作：中国文明是一个不局限于明确的边界之中却又与中国本土具有松散联系的文明。当邻居们将其统治施于中国之时，我的参照之点就是这种遭遇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尽管我已缩小了我给予“中国”的含义，但我并没有把它缩小到中国的政府或中国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中国人及其创造的文化。

伊佩霞

## 致 谢

本书的大多数思想都得自他人。我在将近三十年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学到的一切，都对本书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影响。而且，在我的书桌干干净净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而在试着从记忆里提取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历史进程的东西时，书桌上却总是堆满了书和文章。我重读了许多记忆中那些有力的和有刺激性的东西，我查阅了——有时甚至是全神贯注于多年来我所购买的、但在此前实际上没时间读的书籍。我引用的许多书被列入了“建议进一步阅读”的书单中，但这个书单决没有偿尽我的知识债，因为我也依赖了一些并非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专业性研究成果。我希望那些看到我采用他们的学术成果的作者会感到高兴——因为我为他们的证据和论点所折服，而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因此得到报酬而不悦。当然，我欠他们的真是太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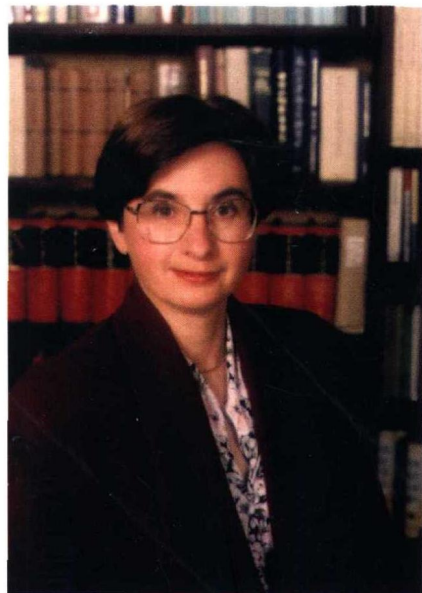
写作此书的部分愉悦来自于为寻找理想的图片而翻阅的大量绝妙的艺术书和考古书。在试图减少我选择的東西时，我把初步挑选的拿给别的汉学家去看，并因此得到了很好的建议。应该特别感谢巫鸿、艾伦·梁、约瑟夫·迈克德莫特和杰西卡·罗森的建议，他们建议颇丰。我同样感谢那些慷慨地阅读和评论了本书一章或几章的同行，他们是安乐哲、阿兰·鲍姆勒尔、蔡宗琪、周凯文、约翰·达代斯、彼得·格里高利、爱弥丽·希尔和戴维·凯特雷。在此书的架构方面，我要感谢得到伊利诺伊大学科研处资助的三位研究生助研。姚平帮助整理图片，凯西·巴托斯和萨曼撒·布拉姆两人帮助准备参考资料和处理相关的杂务。最后我也感谢刘广京教授，他作为顾问编辑阅读了全部手稿，并且为本书撰写了《写在前面》。

我还要将此书献给两位中国史学者易劳逸和霍华德·威希勒两位先生，他们是以前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写作此书使我更难和他们见上一面，但我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会常常停下来想想他们是怎样处理某个问题的。<sup>①</sup>

伊佩霞

<sup>①</sup> 以上译名除刘广京、易劳逸以外全系音译。——译者注





### 作者简介

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在东亚研究领域, 她著述颇丰。著有《中华文明史资料》、《中国唐代和宋代的宗教与社会》等著作, 其中《屋里人: 中国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于1995年获得约瑟夫·P·利文森奖。

# 目录

中译本序  
写在前面  
序言  
致谢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公元前 771 年以前)	
	青铜器上的人兽图案 .....	001
第二章	哲学基础：东周时期(公元前 770—公元前 256 年) .....	024
第三章	官僚制帝国的创立：秦汉(公元前 256—220 年) .....	040
第四章	佛教、门阀政治与外族统治者：分裂时代(220—589 年)	
	早期佛教艺术 .....	060
第五章	世界性的大帝国：581 年至 907 年的隋唐 .....	076
第六章	重心南移：宋朝(907—1276 年)	
	山水画 .....	098
第七章	外族统治：辽、金和元朝(907—1368 年)	
	戏曲与表演艺术 .....	120
第八章	独裁的局限：明朝(1368—1644 年)	
	景德镇瓷窑 .....	140
第九章	满族与帝国主义：1644 年至 1900 年的清朝	
	为了生存 .....	164
第十章	行动起来：20 世纪前期	
	现代中国画 .....	198
第十一章	彻底的重新统一：1949 年以来的中国 .....	224
跋	.....	255
年表	.....	258
对图片提供者的感谢	.....	262
引文注释	.....	264
进一步阅读书目	.....	267
索引	.....	276
译者后记	.....	294

##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 (公元前 771 年以前)

大多数民族都有关于他们自身起源的神话，中国人也不例外。在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有学问的中国人用一套“伟人”理论来说明他们的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通常把上帝作为他们的造物主或祖先，而是把那些使中国人一步步由原始人变为高度文明人的发明创造，归功于一个个光芒夺目的超人。伏羲意即牛的驯化者，他驯化了动物，创造了家庭。神农意即具有神性的农民，他发明了犁和锄。黄帝即黄色的帝王，发明了弓箭、船只、马车、陶器、文字以及丝绸。他还与其他部落进行了一场大战，为他的人民夺取了黄河流域的大平原。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他被列为“五帝”之首。五帝之中的后两位是尧和舜<sup>①</sup>。尧据说制订了历法和礼仪，他没有把权力传给他那没名望的亲生儿子，而选了舜做继承人。舜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他全心全意地服侍他的瞎眼父亲和邪恶的继母，这说明了他的孝。舜不仅成为尧之后的统治者，而且还和尧的两个女儿结了婚。但无论他们的品德是多么高尚，尧和舜却无法制服洪水，于是舜任命了一位官员——禹去处理此事。在此后的十多年里，禹穿越土地、疏通河道，把洪水变成了华北的河流。禹治水是如此专心，以至他几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停一下去看望自己的妻儿。舜指定禹为他的继承人。禹把统治区域划分为九州，铸了九鼎作为各州的象征。禹死后，人们无视他指定的继承人而拥护他的儿子来领导他们，开了世袭王朝统治的先河。这样，禹和他的儿子便成为夏王朝最先的两个王<sup>②</sup>。夏朝的统治延续了14代。到夏桀这个暴君被他的一个下属废黜时，夏朝被推翻，篡权者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商。商朝的统治延续了30代，直至一个荒淫无道、不听劝谏的王失去他的贵族和人民的支持，而被自西而来的周朝的军队轻而易举地推翻。周朝是上古三代（夏、商、周）中的最后一个王朝。

这些传说揭示了从孔子时代(公元前500年)开始到“中国”形成这一段时期有文化的中国人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中国可以被定义为技术与国家管理——农业、文字、治水，结合了美德和世袭继承的君主制，等等。他们把中国的故事记载成为单线的叙事故事或家谱：专注于一个个统治者的继承。因此，中国的过去就像一个家庭的过去，它可以通过一个个的祖先的单一线索由近及远地追溯回去。

通过研究地质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现代学者会毫不令人惊讶地构造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不同故事。他们的描述并没有对农业、文字、青铜技术和国家结构不屑一顾，但往往与传统故事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了礼仪和宗教在塑造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以王朝世系为中心的单线发展的历史，而是把它看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各种优秀的文化相互作用，其中一些或许还曾经被商周统治者明确视为外夷文化。这些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演进。

① “五帝”中的另两位是颛顼和帝喾。伏羲和神农是“三皇”中的两位。——译者注

② 一般认为，禹的儿子启是夏的第一个国王。——译者注

## 中国次大陆的地理环境

中华文明是在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得到发展的，它处在欧亚大陆东部较温和的地带，幅员辽阔而又具多样性，为初民创造了许多机会，但同时也造成某些困难。中国本土南北长和东西长都在1610公里以上<sup>①</sup>，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广州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于从班果尔到迈阿密，或从奥斯陆到巴塞罗那，从西部的成都到东部的上海之间的距离则几乎等同于从巴黎到华沙，或从得梅因到纽约。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山脉纵横，把更适合人居住的河谷相互割开，而正是在这些河谷地带，建立起最早的人类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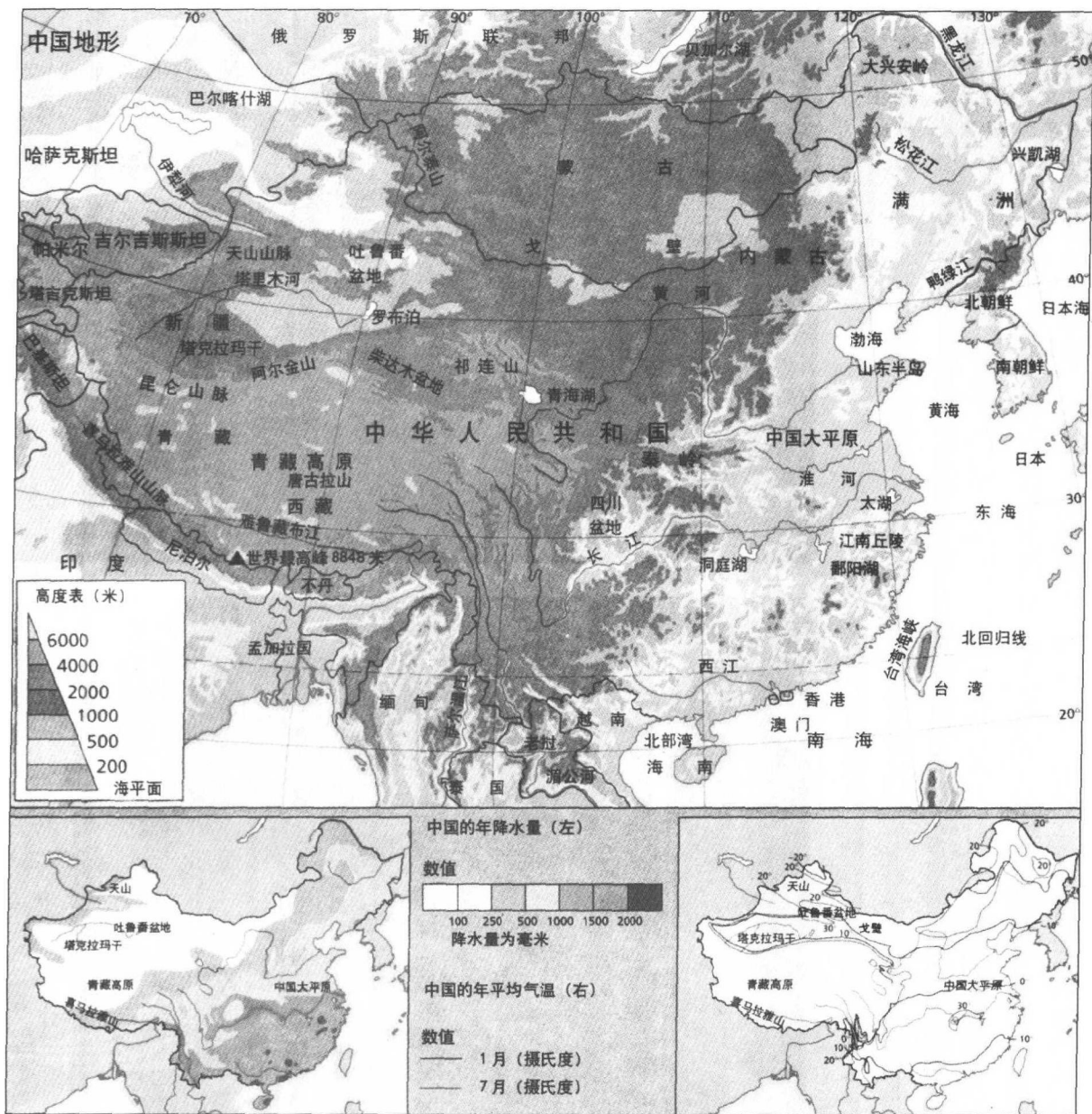
两条大河由西向东流过中国本土，黄河在北方，长江在中部。黄河源于西部高原，几经急转，流经北部沙漠，然后迅疾地由北向南，穿过黄土高原——这种黄土是细小的、由风携来的黄色土壤，很肥沃，即使用原始工具也易于耕作。在黄土高原的南端，黄河急转向东，河面渐宽，有大量黄色泥沙，两岸间有一英里或更大的宽度。最终它穿越了整个冲积平原，流入大海。另一条大河长江汇合了许多支流，携带了巨大的水量。它起源于青藏高原，跨过环绕四川盆地的高山，流过峭壁千仞的险峻峡谷，然后向东奔流千余英里到大海，每天都要把平均半立方英里的江水送入太平洋。

被这两条河灌溉的区域在土壤、地形、气温和雨量上都有不同。北方较寒冷、平坦、干燥，生长期较短，土壤更富碱性，这使其适合于麦、黍等作物的种植。黄河以北的雨量对于灌溉农业来说尚嫌不足，许多地方的年均降水量少于20英寸，水旱之灾的发生率高于南方。黄河易于泛滥，是因为流经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时，它携带的泥沙在河水东流且流速减慢的过程中慢慢沉积。由于泥沙使河床增高，千百年来，农民和官兵筑起了坝堤，保证河水不漫出河道。但由于洪水极具破坏性，经常大面积泛滥，所以洪水发生的时候，总是要进行这样的工程。

被长江灌溉的区域比北方温暖，大多数地方四季长青，年降雨量在60英寸以上，适合于稻作和两季种植。长江和数不清的、纵横交错的小河利于航行，使南方成为适合水路交通的地方。相反，在北方直到现代以前，人们还都是借助陆路交通，或徒步，或骑马骑驴，或乘牲口拉的大车。

一大片不适合农耕的地区把中国与其他最近的早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隔开。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北方，是中亚大草原，那里比中国北方更寒冷、更干燥，土地用于放牧而非用于农耕。中亚的主要居民不是汉人，那里是匈奴和蒙古人——汉人的宿敌——这些游牧民族的家园。这些大草原横跨欧亚大陆直到乌克兰，但广袤无垠的沙漠把中国本土与西北的大草原相分离。在那些沙漠地区，除了极少的绿洲之外寸草不生。在它们的南边，也就是在中原的西南，是“世界屋脊”的西藏。那里的高山峻岭就像北方的沙漠和草原一样，不适合于汉人的农耕生活。西藏东南的多山地区（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的，但是直到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直接穿越它们进入南亚和东南亚之时，航海是一个更切合实际的选择。

<sup>①</sup> 此处说法不准确。我国领土最北端在黑龙省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最南端在南沙群岛南缘的曾母暗沙，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最西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以西的帕米尔高原，最东端在黑龙省抚远县境内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主航道汇合处，东西相距约5200公里。——编者注



如果我们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看待中国次大陆,我们一定要把曾经见过的所有地图从心中抹去,因为那些地图只是将中国视作占据了欧亚大陆的一小块土地,而且离大陆的另一端是那样的遥远。中国次大陆是如此辽阔,以至于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时,中国人就把它视为“天下”,是人类演出文明戏剧的地上舞台。它周围是辽阔的海洋、荒凉的沙漠和险峻的高山——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说是不那么具有中心地位的区域。它们之外是什么,没有人确切知道,但是毫无疑问,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这里就是文明的中心。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文明与农业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的 earliest 阶段发育于河谷地带,在那里,即使是使用原始技术,也可以栽培谷物。这些早期聚落在欧亚大陆东部气候较温和的地区不断扩展。<sup>①</sup>

<sup>①</sup> 此处原作者使用的地图在西部中印边界上采用的是我国并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特此说明。——译者注

图中所示的黄河系因所携带的泥沙使它看上去很浑浊而得名。中国北方平原的土壤主要是风成黄土和水成黄土，这致使早期的中国人认为土地就是黄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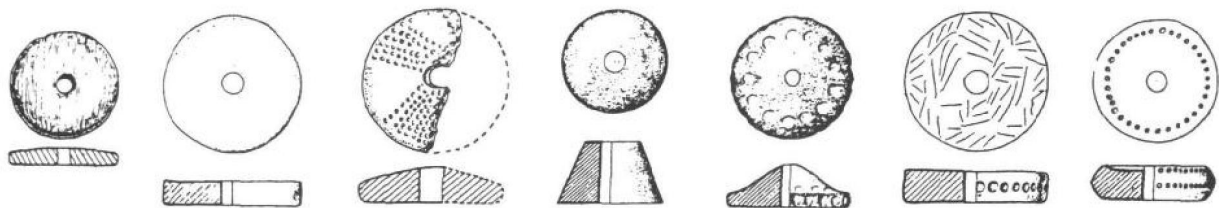
与寒冷干燥的北方相比，南方水源充足的丘陵和山谷提供了更为繁茂的景观。





仰韶文化(公元前3200—公元前2500年)<sup>①</sup>陶器上的各种图案经常来自于鸟、鱼、蛙和其他野兽的形象,它们最初可能具有图腾的意义。这一大堆彩陶上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但并没有显示出这些陶器的用途,因为没有一座墓葬能把如此众多的陶器摆放在一起。

<sup>①</sup> 仰韶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分布广、延续时间长、内涵丰富,其时间跨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译者注



纺织技术的最早标志是浙江河姆渡发现的纺锭盘的出现，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这些木、陶锭盘被用于捻麻纱，以使它们结实得足以用来织布。

## 史前史

称为直立人的早期人类在中国次大陆上已经出现一百多万年了，在地质年代的更新世时期(冰期)从非洲和西亚渐次迁移而来<sup>①</sup>。即使没有大冰川扩展到中国，但平均气温也比后来要低，在华北，猛犸、麋、驼鹿在四处漫步。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北京人是直立人的最好例证之一，他们能直立、打猎、生火，并会使用切削石器。

现代人在大约十万年前出现在东亚，大概也是从非洲某地迁转而来的。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公元前10万—公元前1万年)，随着食肉的猎人和采集者的出现，人类开始说话。语言扩展了象征能力，例如语言促成了神灵与亲族观念的发展。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我们有理由设想，有许多人群横跨中国次大陆，四处迁移，在遭受对方威胁的时候，他们相互搏战，在命运使他们幸存下来的时候，则或分或合，有些早期的族团迁移到了太平洋诸岛或者美洲大陆。在何种意义上那些在中国次大陆度过一段时光的早期人类，应被视为历史上中国人的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此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史开始得更晚些，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的最后一次冰期之末。到公元前5000年，具有农业、制陶、村落和纺织的新石器文化在今日中国大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出现。农业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变化，因气候变暖变湿而受益(甚至比今天还要暖湿)。栽培作物使中国先民的聚落更密集、更长久，制陶和

这个制作精美的石磨盘大约长20英寸，宽8英寸，出土于河北省磁山的一个新石器村落遗址，时间不晚于公元前5000年。甚至在谷物得到驯化之前，石器就被用于食品加工。这件石器大概就是用来磨碎未被驯化的植物根茎的，以使它们更易被消化<sup>②</sup>。



① 原始人类是一元发生而后向外传播的，还是多元发生、独立起源的，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这里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译者注

② 此说不确，因为已经发现这一时期的驯化了的农作物。——译者注

纺织使他们的生活大为舒适：陶罐对于汲水和储存粮食非常便利；用布制成的衣服和被褥能够御寒。照料庄稼、织布和制陶要求有与狩猎不同的各种技术和社交技巧，这样武士们就不得不与熟练而有经验的长者平分领导权。与此同时，永久性的聚落导致了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一种地域性的单元——村落，补充着以亲族为基础的组织形式。

如果无视后来的历史传说，而只是考察实物遗存，我们可以根据纬度把这些新石器文化分成南方稻作区和北方粟作区。在长江流域，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就已经开始种稻了，并有鱼类和水生植物作为补充，如莲、荸荠以及菱角。在河姆渡（浙江省的一处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建造了高脚木屋，制作了雕有几何图案的漆碗和黑陶器皿，筐和织物得到高度发展，居民们遗留下的纱锭的锭盘是用来捻纱的，还有一些织布用的梭子。其他木制工具还包括锄、叉、槌和桨。换句话说，河姆渡村民的技术水平已经高出于17世纪多数的北美印第安部落了。

中国的北方既寒冷又干燥，不适宜种水稻，所以麦类就代替了黍类成为北方农业的基础。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北磁山遗址表明，人类用石镰割黍，并把它们放在饰有绳纹或梳状印记的陶碗、陶罐或三足钵里。中国北方到处是黄土，这对于当时原始农民来说，其耕作相对容易些，原因在于黄土比较容易开垦，且土质疏松，为新鲜的营养进入土地表层提供了条件。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动物的驯化总是伴随着植物的驯化而来。早在公元前5000年，中国南北两个地方都有了狗和猪。到公元前3000年，羊和牛已成为北方的主要牲畜，而南方则是水牛和牛。

除了基于生产技术的南北差异之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也可以根据艺术形式和丧葬风俗被鲜明地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的仰韶文化区（在今陕西、甘肃境内，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葬制一般比较简单。陶器上经常刻画着几何符号，盛谷物的罐子被画满了红色和黑色的螺旋型图案、菱形图案和其他一些几何图形，这些陶器的外形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实用的瓶形或缸形。与之不同的是，在东部即从辽宁到上海这个地区，陶器上很少有图案，但是外形更复杂的陶器却很早就出现了。这其中就包括了三足钵以及有基座的陶碗和陶杯等等。最漂亮的陶器是在陶轮上制成的，壁很薄，表面非常光亮，看起来就像金属一样。还有许多陶器是用复合构件拼成的，包括足、喷嘴、把手或盖子等等。在这些区域，最常见的外形是大口水罐和高脚杯。这些都显示出了这一地区举行盛宴或祭祀时的种种礼仪。同样，东部的葬制也日渐复杂。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遗址中，某些死者被埋在棺材里，偶尔也造一个木头的墓室并把葬坑排成一行，这些措施起了进一步的保护作用。在这个遗址的最富有的墓穴里，有50件、60件或者100多件物品，比如包括用玉器、石头或陶制小珠做成的项链和手镯等等。大汶口文化还有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就是许多人的上侧门齿被拔掉了，很久以后，中国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蛮夷的习俗。

新石器时代最壮观的发现来自辽宁省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3500年）和江苏省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地区直到2000年前还不被视为纯粹的“华夏”地区。在红山文化中，玉被做成各种装饰物，或者是一些小雕像，如海龟、小鸟，还有奇怪地被弯成环的“猪龙”。这些小雕像是在祭祀用的石制建筑旁边发现的，说明它们已经有了象征的或宗教的含义。同样，在良渚文化中，玉也被制成

这个高脚杯是在山东泰安出土的。杯壁极薄，薄似蛋壳。这样制作精美的黑陶器皿代表了大汶口文化的风格（公元前2300年）。

